

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

牛汝极

泉州发现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已有半个多世纪，其文字的解读虽经中外学者的不懈努力，但因碑铭上的文字和语言属不同体系和来源，不得要领，无果而止。笔者经多年研究，终于找到了解读这种铭文的钥匙，使扑朔迷离的叙利亚碑铭之谜得以揭开，泉州和扬州的景教传播及其来源得见天日。本文首先对泉州和扬州发现的几方叙利亚文和一方回鹘文景教铭文一一转写、标音、汉译并考释；其次，探讨了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文章认为，元代泉州和扬州的景教徒大多为回鹘后裔畏吾儿人。此外，本文还对全国各地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作了交待，并对泉州发现的八思巴文景教铭文作了分析和修正。

作者牛汝极，1958年生，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唐代基督教聂斯脱利派 (Nestorian) 传入中国时被称为景教，元代改称“也里可温”，突厥语记作 *ärkägün*。随着景教徒的来华，他们使用的叙利亚文也被带到了中国，首先是新疆地区。在叙利亚本土，这种文字约在 4 至 6 世纪才被广泛使用，后来，也就是在 7 世纪以后因受阿拉伯文的限制，开始走向衰亡。然而，在中国西北，唐、元二代，这种文字仍有一定的市场。在敦煌和新疆还发现过《圣经》的回鹘语译本片断。在中亚七河流域、喀什、阿力麻里古城（在今霍城县）等地区景教教堂遗址中发掘出用叙利亚文写成的突厥语景教碑数十件。中外学者普遍认为，回鹘人在宋末元初时曾信奉过景教，且盛极于元初。叙利亚文字体有福音体、雅各派体和景教派体三种，字母约有 22 个，在外形上与摩尼文很相似。自西安发现汉文—叙利亚文双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来，中国东西南北均有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碑铭文献出土，如：新疆的霍城、吐鲁番、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四子王旗、赤峰、北京房山、福建泉州和江苏扬州等地。中国发现的回鹘语（突厥语）景教碑铭文献多用叙利亚文和回鹘文写成，其时代约在 9—11 世纪和 13-14 世纪之间。

福建泉州出土过大约 23 方元代景教徒墓碑或石刻，有文字的铭文 19 件，其中带叙

德国第三次中亚探险 (1905-1907) 曾在吐鲁番获得过几件叙利亚文突厥语文献。其中一件编号为 T Kurutka1857 的正背两面为一景教文献，曾为德国回鹘文专家 Peter Zieme 刊布：Ein Hochzeitssegen Uigurischer Christen, Scholia Beiträge zur Turkologie und Zentralasienkunde, A. Von Gabain zum 80. Geburtstag am 4. Juli 1981, dargebracht Von Kollegen, Freunden und Schülern,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PP.221-234. 该文献正背两面存 36 行，首尾残缺。

利亚文的碑铭约有8件，汉文碑铭5方（其中有的是双语），八思巴文墓碑4方，回鹘文墓碑1方。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陆续出土大量叙利亚文景教碑铭，虽有中外学者尝试解读破译碑铭上的语言文字，终因难度较大和不得要领而作罢。景教碑铭的文字为叙利亚文景教体，元代之后不再使用，其所纪录的语言为叙利亚语和回鹘语，要释读这种文字，必须同时掌握叙利亚文景教体和回鹘语或古代突厥语。近年来笔者调查了中国所出大部分叙利亚文景教碑铭，逐碑研读，并完成了许多叙利亚文铭文的释读。本文打算首先介绍泉州出土的两方叙利亚文和一方回鹘文景教碑铭及扬州出土的1方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然后，就铭文情况探讨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

一、泉州和扬州的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碑铭解读

一件叙利亚文拼写回鹘语的景教墓碑，于1943年在泉州仁风门（东门）外东教场附近的园圃中获得，现藏泉州海交史博物馆。该碑高36厘米，宽30厘米，碑上刻一个十字架，但没有天使、火焰、莲花、云片等装饰雕刻。这是泉州所见景教石刻中较特殊的一件。十字架下刻有11行叙利亚文聂斯托里字体拼写叙利亚语和回鹘语，其中，第1行为叙利亚文叙利亚语，其余10行为叙利亚文回鹘语。从碑文可知，刻碑者不懂叙利亚文，文字刻写得很不规范，并有一些误笔，这给释读碑文带来了许多困难。此碑虽发现有半个多世纪，但因中外叙利亚文专家不懂回鹘语或突厥语，而回鹘语或突厥语专家又不懂叙利亚文，加上叙利亚文的刻写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所以至今此碑没有满意的释读。据吴文良先生报道，英国学者Segal和Goodman曾有一个极不完整的翻译：“在父及子及圣神的名内。亚历山大，萨沙（？）在脚下，主（？）相信者，宗教。Tabt(地方名字)萨沙（？）萨沙的儿子。日子到来（？）府（？）你异教徒们，（？）亚孟。”显然，作者不懂这种语言，其译文无法让人理解，也未作转写和考释。下面是我们的释读翻译。

汉文译文：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亚历山大帝王纪年

1613年(即公元1301年)，

桃花石纪年牛年十

月二十六日。高昌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景教图版。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图版3、7、6、9、10。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出版，1966年，第182-186页。

照那斯图：《元代景教徒墓志碑八思巴字考释》，《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119-124页。

J. Hamilton, 牛汝极：《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第78-83页。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考古学专刊乙种第七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8月，第30-31页。

城人图克迷西·阿塔·艾尔
之子乌斯提克·塔斯汗
在他六十七岁时，
来到刺桐城并
完成了上帝的使命。
他的灵魂将在天国安息。阿门！

另一方叙利亚文回鹘语—汉语双语景教碑铭，1956年发现于泉州通淮门外，汉文两行，叙利亚文两行。汉文为：“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斯古八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1313年9月5日）帖迷答扫马等泣泪谨志”。其叙利亚文回鹘语的转写和译释先由村山氏刊布，后由夏鼐先生译介为汉文。他们的转写和译文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墓碑主人问题，他们认为此碑是献给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这是不妥的。下面是我们对该碑叙利亚文回鹘语部分的标音、转写和译释：

译文：“这是马可家族的主教马里失里门·阿必斯古八之墓。（牛）癸年八月十五日（1313年9月5日）扫马领（队）来此并题铭。”

考释：以往学者们把此碑主人理解为两个人：马里失里门·阿必斯古八和马里哈昔牙。一方墓碑应该只献给一个人才合情合理。经查，马里哈昔牙（*marī ḥasira*）是叙利亚语“主教”、“圣者”之意，是马里失里门·阿必斯古八的头衔和称号。回鹘语头衔和官号通常放在人名前，因而叙利亚文回鹘语才有称号 *marī ḥasira* 加人名 *marī šlemun abisquba* 的结构；相反，汉语头衔和官号常放在人名之后，所以才有汉文铭文中的“马里失里门·阿必斯古八 + 马里哈昔牙”的结构。泉州景教徒曾与西域撒马尔罕的主教有着密切的联系。约在1221年马尔埃里查（*Mar Elijah*）任主教时，成吉思汗把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并入其帝国。景教徒以其宫廷医生之名而显赫四方。当成吉思汗之子拖雷生病时，他们用祈祷和果子露将他治好。他们为人祈祷时，由一位最可敬的主教（*Mari Hasia*）带领。1268年，忽必烈汗闻马尔埃里查大名，邀他到中国朝廷并赐他高官厚禄，但他仍不忘传教使命。为此他弃官建造寺院，阐释基督教教义，并从西域请来主教马里失里门（*Mar Solomon*），他来中国大概在13世纪80年代，此马里失里门可能就是此叙利亚文碑中的马里失里门，据此碑铭可知他死于1313年。

泉州发现的唯一一方回鹘文回鹘语景教徒墓碑，1941年出自泉州东门外，1955年移入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该碑仅存八行回鹘文，下面是我们的标音、转写和译释：

S. Murayama, Eine nestorianische Grabinschrift in Türkischer Spracher auz Zaiton, UAJb 35 (1964), pp.394-396;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第59-62页。

克里木凯特著，林悟殊翻译增订：《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台湾淑馨出版社1995年，第133-134，171页。

同上，第163-164页。

参见 James Hamilton et Niu Ruji, 《Deux Inscriptions Funeraires Turques Nestoriennes de la Chine Orientale》，*Journal Asiatique*, No.1, 1994, P.159; James Hamilton, 牛汝极：《泉州出土

译文：“幸福而圣洁的也里可温教贵妇马尔达公主，于羊年（1331）腊月，满，二日，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愿她在神圣的天堂（安息）。”

1981年在扬州曾出土一方叙利亚文—汉文景教墓碑。这是已知扬州发现的唯一一件景教徒墓碑。该碑下段右侧存三行汉文：“岁次丁巳延祐四年三月初九日三十三岁身故五月十六日明吉大都忻都妻也里世八之墓”。人名“也里世八”对应的叙利亚文突厥语为：Alīšbaā，其对应的西方语言为 Elizabeth “伊丽莎白”，基督教女教徒名。该碑上圆下方，一面单刻，分上下两段，上段约占全碑三分之一弱，上段中间是莲花座上配双线十字架，两侧分别镌以一四翼振飞的天使，其头各戴一双耳冠，冠顶立一十字架，两天使飞向莲花，双手前伸，守护着十字架。该碑下段左侧有12行叙利亚文，其中第1和第12行为叙利亚文记叙利亚语。此墓碑仍是献给一位女士的。

译文：“（1）〔叙利亚语〕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2）〔突厥语〕亚历山大帝王纪年1628（3）年（即公元1317年），突厥纪年（4）蛇年3月初9日。大都（即北京）人（5）Yoanis Sam--a的伴侣也里世八（Alīšbay）夫人（6）她在33岁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7）故去了。她就葬此墓地。（8）愿她的灵魂永久地在天堂（9）与 Sarah、Rebekka、Rahele（等）圣洁的贵妇们同归（10）故地。愿她英名永存！（11）愿她流芳百世！（12）〔叙利亚语〕阿门！阿门！”

二、泉州和扬州的景教徒主要来自我国北方畏吾儿人

探讨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对于了解和搞清元代我国东南地区中外文化交流、当地的民族和文化融合状况意义重大。随着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对于泉州和扬州景教来源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景教由陆路从中国北方传入泉州和扬州是毫无疑问的。前不久有学者根据泉州在元代是世界著名的海港及一些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碑铭文断定，景教传入泉州曾经由不同路线——陆路和海路汇聚于刺桐港。我们认为，泉州景教经南印度由海路来自波斯的根据不充分。从泉州和扬州出土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碑铭看，这些景教徒大多为古代操突厥语的民族，准确的讲主要是回鹘人的后裔畏吾儿人。从《元史》可知，元代有大量的畏吾儿人被元朝政府重用，其中有不

也里可温（景教）墓碑研究》，《学术集林》卷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70-281页。据王勤金《元延四年也里世八墓碑考释》，载《考古》1989年第6期第553页；朱江只报道该碑出土于1981年而未说明何月何日，见朱江《扬州发现元代基督教徒墓碑》，载《文物》1986年第3期第68页。

十字架下配莲花的图标屡见于中国元代景教遗物。如泉州、房山、敦煌、赤峰、百灵庙等地出土的大量景教遗物中均有此图标。参见 P.Y.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37; 朱谦之著《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J. Hamilton et Niu Ruji 上引文；上引盖山林文。这种十字架下配莲花座的两侧各有一飞翔的天使的类似图像以泉州出土景教碑中最多见，据笔者统计最少不下七方。可参见朱谦之上引书之图版。

参见杨钦章：《泉州景教石刻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第100-104页；

杨钦章：《元代南中国沿海的景教会和景教徒》，《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49-55页。

少是在南方做官。除了一部分回鹘人信奉景教外，汪古、乃曼、克列等部族也信仰景教。汪古（回鹘语称作 öngüt，由 öng“东方”+ 名词复数词尾üt 构成）原属回鹘东支，是回鹘后裔的一部分，后东迁河西、内蒙古、辽东，后又迁居内蒙古阴山一带。泉州和扬州出土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的语言是纯粹的回鹘语，与新疆、敦煌、内蒙古等地发现的大量回鹘语文献和碑铭的语言没有两样。为了说明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有必要对我国其他地方发现的元代景教碑铭和文献情况作一交待。

在新疆阿力麻里古城（今霍城县）到目前为止发掘出叙利亚文景教徒刻石约有 10 件。这些刻石与中亚七河流域出土的约六百余件景教徒碑石非常相似。吐鲁番出土大部分基督教文献都出自吐鲁番北部的布拉依克废墟。德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中亚探险队在这里发掘了一批残缺的写本，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叙利亚文的使用上看，其中大部分均为基督教文献。叙利亚文写本中使用的主要是粟特语和叙利亚语，但也有四五十件叙利亚文回鹘语残片。A.Mingana 曾译释了一篇新发现的大约写成于公元 680-1000 年间的叙利亚文文献。这件文献提及突厥人只用叙利亚语阅读《圣经》，把《圣经》译成突厥语，文中提及高昌回鹘亦都护汗王。

在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有几处景教遗址发现叙利亚文突厥语墓碑铭文：1. 在敖伦苏木古城（俗称“赵王城”）内外，1973 年曾发现叙利亚文突厥语景教墓碑 9 块，文字多者存 5 行，均有十字架。还发现有 9 块刻叙利亚文景教徒墓顶石。其中一方为叙利亚文 - 汉文 - 回鹘文三语合璧石碑。其中另一方存 13 行叙利亚文突厥语的石碑，虽断为两段，但保存较好。2. 木胡儿索卜尔嘎古城东北约 100 米的景教徒墓地上发现有约 30 件景教徒墓顶石，其中多数带叙利亚文突厥语铭文。此外，在内蒙古还发现过一些带叙利亚文的墓石。3. 比其格图好来陵园，70 年代发现至少 5 件叙利亚文小方碑，但未发现景教墓顶石。在四子王旗附近的“王墓梁”耶律氏陵园 1973 年发现 17 块带有十字架和

D.Chwolson, Syrische Grabinschriften aus Semirjetschie, Memoires de l'Academie Impe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etersbourg, e Serie, t. , 4, St.-Petersbourg 1886.

——, Syrisch-Nestorianische Grabinschriften aus Semirjetschie. Nebst einer Beilage: 《Über das türkische Sprachmaterial dieser Grabinschriften》Vom Akad.W. Radloff, Mem.Ac. Imp.Sc.de St.-Petersb., t. , .8, St.-Petersbourg 1890; Neue Folge, St.-Petersbourg 1897.

D.Chwolson, Syrische Grabinschriften aus Semirjetschie, Memoires de l'Academie Impe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etersbourg, e Serie, t. , 4, St.-Petersbourg 1886. ——, Syrisch-Nestorianische Grabinschriften aus Semirjetschie. Nebst einer Beilage: 《Über das türkische Sprachmaterial dieser Grabinschriften》Vom Akad.W. Radloff, Mem.Ac. Imp.Sc.de St.-Petersb., t. , .8, St.-Petersbourg 1890; Neue Folge, St.-Petersbourg 1897.

D.D.A.Mingana, 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A New Document, in: Bulletin of John Rylands Library Manchester, Vol.9, No.2, July 1925, pp.297-371.

盖山林著《阴山汪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70-271 页。

同上，第 271-273 页。

同上，第 278 - 281 页。

叙利亚文突厥语的景教徒墓顶石。上述内蒙古地区共有约 70 件景教墓石，其中约半数带有叙利亚文突厥语铭文，至今未被研究。墓顶石上的叙利亚文突厥语铭文多为一句话，几乎都由 bu qabra “此碑” + 人名 + ol “是” 构成，意为“这是某某人之墓”。

在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曾出土一方叙利亚文 - 回鹘文合璧景教徒瓷制白釉墓砖，叙利亚文保存 2 行，与房山十字寺出土的刻有十字架墓石上的两行叙利亚文完全一样，意为“仰之，信之”，此句出自《圣经·旧约全书》的《诗篇》第 34 章第 6 节。下方存 8 行回鹘文，与泉州和扬州发现的叙利亚文回鹘语铭文的语句、格式大同小异。下面是赤峰出土的景教徒墓碑铭文转写和译文：

- 1、“亚历山大大帝王纪年一千
- 2、五百六十四年（1253），桃花石
- 3、纪年牛年正月
- 4、二十日。这位京帐首领
- 5、药难——军队的将军，在他
- 6、七十一岁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
- 7、愿这位大人的灵魂永久地
- 8、在天堂安息吧！”

在梵蒂冈秘密档案中曾发现几件 13-14 世纪回鹘式蒙古文及叙利亚文突厥语和波斯语文献。其中一件为《贵由答因诺曾爵四世书》的波斯语译文，其中第一句为突厥语：“长生天气力里，大民族全体的海内汗圣旨”，文中夹写大量回鹘 - 突厥语；在聂斯托里大主教玛尔·雅巴拉哈三世于 1302 和 1304 年写给罗马教皇的两封书信（编号为 A.A.Arm. I-XVIII, 1800, 1 和 2）中发现了四枚带有十字架的叙利亚文记突厥语的朱色方印，其中的叙利亚文和所记突厥语与七河流域、中国各地发现的景教铭文十分相似，其前两句意为：“长生天气力里，蒙哥可汗圣旨”。蒙元时代，可以说中亚地区突厥语民族是主要的景教民众，在中国大地上，畏吾儿人是主要的景教徒来源。畏吾儿先辈回鹘的景教信仰曾经强烈地影响了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皇室贵族。在泉州发现的 4 件八思巴字景教徒墓碑应该是蒙古或畏吾儿官吏的信仰景教的汉族夫人或是汉化的畏吾儿女子的见证。蔡美彪先生先将其中的 3 件分别翻译为：“叶氏墓址”、“易公柳济墓址”、“开珊朱延珂子云墓”。后照那斯图先生刊布了 4 件八思巴字景教碑，其中 3 件是蔡先生刊布过的，

同上，第 276 - 278 页。

参见 James Hamilton et Niu Ruji, 《Deux Inscriptions Funeraires Turques Nestoriennes de la Chine Orientale》, Journal Asiatique, No.1, 1994, P.159; 另见 J. Hamilton, 牛汝极:《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民族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78-83 页。

同上,第 19、24 页。

J. Hamilton, Le Texte Turc en Caracteres Syriaques du Grand Sceau Cruci forme de Mar Yahballaha III, in: Journal Asiatique, 1972, pp.155-170.

参见上引吴文良著《泉州宗教石刻》,第 34 页。

照那斯图:《元代景教徒墓志碑八思巴字考释》,《海交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他分别翻译为：“叶石墓志”、“易公刘石墓志”、“开山朱延可訾云墓”、“翁叶杨石墓道”。一方墓志应该只献给一位死者才对，一方石碑同时献给四位甚至七位死者是很难让人理解的。我们认为，这四件铭文应该理解翻译为：“叶氏墓志”（是一位姓叶的女子之墓）“易公刘氏墓志”（易先生的夫人刘氏之墓）“凯珊·居延女儿云之墓”（凯珊·居延的女儿名为云的墓志。“可孜”、“珂子”、“可訾”为回鹘语 qiz-i “姑娘”、“女儿”之译音，“云”可能是其名或者爱称。此墓碑主人大概来自畏吾儿家庭）“翁叶杨氏墓道”（叶先生的夫人杨氏之墓）。就是说，这四方墓碑均是献给女性的。中国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碑主人也多数都是女性，这一点耐人寻味。

不仅泉州景教深受畏吾儿的影响，而且泉州伊斯兰教也与西域畏吾儿等民族关系密切。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中的《重立清净寺碑》提及西域高昌及高昌达鲁花赤畏吾儿后裔契玉立与泉州伊斯兰教的密切关系。一件阿拉伯文墓碑上记有“这是最尊贵、伟大、受人尊敬的殉教者——哈只·本·艾欧伯克·本·哈只·玛利卡（Haji b. Aubek b. Haji al-Malaq）时 689 年 8 月 27 日（公元 1290 年 9 月 4 日）”，其中人名中的 al-Malaq，即阿力麻里（回鹘-突厥语多写作 Almaliq，“苹果之乡”），在今新疆霍城县境内，“伯克”是回鹘语 bek “官吏”之译音，说明这是来自西域的畏吾儿人。另一件阿拉伯文-波斯文墓碑铭文为：“这是亲爱的、善良的母亲——著名的法蒂玛·哈通（Fatima Khatun）之墓。她是阿里·特勤·苦汗提（Ali Takin al-Kuhatis）的女儿。……中国农历十二月初八日，年为鳄鱼年（1329 年 1 月 8 日，龙年）”，其中的 Khatun “夫人”也出现于泉州回鹘文景教碑中，Takin 为回鹘—突厥语官号“特勤”，此处用作人名，波斯文 nihanka 可译作“鳄鱼”，该词来自梵文 naga “龙”一词，宋代西域著名回鹘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突厥语辞典》中曾说回鹘人也使用动物十二生肖纪年体系，其中有 naga yili “龙年”，有人译作“鳄鱼年”。此外，伊斯兰教石刻中还发现回鹘—突厥语广泛使用的人名：Toghan-shah “鹰王”、Sultan khan “苏丹汗王”等。综上所述，元代泉州的宗教与西域畏吾儿人保持着密切和经常的接触，其中，景教和伊斯兰教的联系最为紧密。从泉州、扬州发现的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碑铭的语言文字与新疆、内蒙古出土大量回鹘语文本保持一致性来看，可以肯定，泉州和扬州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墓碑主人多为畏吾儿人。

（责任编辑 辛 岩）

参见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图 21，第 9 页。

同上，图 32-1，第 16 页。

同上，图 50，第 22 页。

the Song,Jin,Yuan Dynasties is to a great extent the result of a mix of the views of Taoism,Taoist philosophy and Buddhist theory about the nature of mind.

Born in 1966,the author is a Doctor of Philosophy,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Nanjing University.

To View the Origin of Nestorianism in Quanzhou and Yangzhou from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Excavated Tombstones

Niu Ruji

Half a century has passed since the discovery of Tombstones with Syrian Inscriptions of Nestorianism of the Yuan Dynasty in Quanzhou,although th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d made constant effort to interpret it,because the letters and languages of the inscriptions belong to different systems and origins,so they could not grasp the key point,and could not gain the achievement of interpretation.After studying for many years,the author has found the key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scriptions eventually,and has revealed the mystery of puzzling Syrian inscriptions,and uncovered the trace of the spread of Nestorianism in Quanzhou and Yangzhou and its origin.First,this paper rewrites,translates,examines and explains several Syrian inscriptions and one Huihe inscription of Nestorianism excavated in Quanzhou and Yangzhou;second,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 of Nestorianism in Quanzhou and Yangzhou.It maintains that the most Nestorianists in Quanzhou and Yangzhou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were Uygur people—the descendants of Huihe people.Moreover,this paper also expounds the Syrian inscriptions of Nestorianism discovered in various places of China,and analyses and revises Nestorianist inscription in Basiba language discovered in Quanzhou.

Born in 1958,the author is director and professo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Northwest of China,Xin Jiang University.

Review on Donald MacGillivray's Activities in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Li Wei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Donald MacGillivray's activities in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ver thirty years(from 1899 to 1930),and reviews his sympathetic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people.The author regards MacGillivray as a dutiful missionary and at the same time approves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orn in 1956,the author is a Doctor of History,and a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Shandong University.